

“迷城”意象中的文明忧思

——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江南文化批判

◎ 邵宁宁

摘要：鲁迅的江南文化书写，具有明显的异质性。从其“我不爱江南”的话语，不但可以读出一种独特的历史体验和文化意识，而且可以读出一种深刻的文明忧思。中国历史上的江南，不只是“烟柳繁华地，风流富贵乡”，而且是一座座因过度奢华造成的“迷城”，因富庶而不断招致侵袭破坏的“芜城”。正因如此，一种对于“繁华易散”的忧惧和迷失，不但贯穿了从屈原、庾信到孔尚任、龚自珍的中国文学传统，而且变幻形态，深植于从韩邦庆、李涵秋到茅盾、穆时英乃至格非、苏童、金宇澄的现当代创作，从而积淀出一种贯穿古今的文化心理原型。

关键词：鲁迅；江南文化；空间感受；危机意识；繁华颓废

DOI:10.19290/j.cnki.51-1076/i.2026.02.040

中国文化中的江南，一向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。与大部分江南文化研究者多侧重阐扬“诗性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”不同^①，鲁迅的江南印象，有更多的社会批判内涵，它也涉及诗性，但却完全不同于习见的一味称美，而更将目光时时投向那些常被忽视的狭小、阴霉、腐败、荒芜、丑陋的事物，从而表达出一种颇具现代主义的审视力度，一种寄寓深远的现实忧思。1935年9月1日，鲁迅写信给萧军，说到后者到上海后对环境的适应，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：“‘土匪气’很好，何必克服它，但乱撞是不行的。跑跑也好，不过上海

恐怕未必宜于练跑；满洲人住江南二百年，便连马也不会骑了，整天坐茶馆。我不爱江南。秀气是秀气的，但小气。听到苏州话，就令人肉麻。此种言语，将来必须下令禁止。”^②

虽然只是私人信件中的一段颇带个人“偏见”的话，但其中包含的许多东西，却涉及地域文化与民族精神认知中一些难以忽视的问题，尤其是其中“我不爱江南”的话语，前人虽已有不少研究，但仍有许多具体的东西，如“土匪气”之“好”、苏州话之应“下令禁止”，以及江南的“小气”等，需要做出更为细致的分析。^③本文暂且搁置前两点，

仅从其江南之“小”的印象切入，由这一含混随性的感受，探析其背后的深层思想与美学内涵；并结合中国文学中“忆江南”“哀江南”的悠久传统，在揭示成因的同时，挖掘这种美学批判的历史内涵与文化指向，为现当代中国江南文化书写的研究，提供新的思路。

一 江南之“小”：空间、心态与历史

“我不爱江南。秀气是秀气的，但小气”，像鲁迅许多深刻的“偏见”一样，这句话看似随意，其实却隐藏着丰富的文化意蕴。江南的“秀气”是人所共知的，它的“小气”又该如何理解？通常所谓“小气”，多指对一个人的感性印象，要么是在对待钱物上的吝啬，要么是待人接物中的狭隘、计较。但将其用于对一种地域的印象，显然并不这么简单；特别是当它与“秀气”相对，其所指就可能包含了一些从空间印象到世态人心，乃至美学格调的相当复杂的东西。

江南文化之“小”，首先是一种空间感受。《阻郁达夫移家杭州》说到他对杭州的印象，有“平楚日和憎健翮，小山香满蔽高岑”之句，劝阻其前行又有“何似举家游旷远，风波浩荡足行吟”之语，虽皆有屈骚情致，但就环境描写来说，又可以说透露了他对江南印象的一些基本的方面。杭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，整体地势比较平坦，虽然周边也有不少山峰，但在真正见过高山大川的人看来，就显得不够奇峻、旷远。1928年鲁迅陪许广平游杭，事后写信给川岛谈及印象，就有“杭州的市容，学上海洋场的样子，总显得小家小气，气派不大”等语。和二萧的通信，也屡屡抱怨：“生长北方的人，住上海真难惯，不但房子像鸽子笼，而且笼子的租价也真贵，真是连吸空气也要钱。”“我生在乡下，住了北京，看惯广大的土地了，初到上海，真如被装进鸽子笼一样，两三年才习惯。”^④这些地方说到的“小”，既和某些空间印象，又和社会感受有着微妙的关联。而所有这一切合起来，就不免会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“偏见”。

从来有关江南文化的研究，首先涉及的都是概

念界定。确认何处是江南，是这类研究中普遍要面对的问题。地理意义上的江南，语义虽有广狭，范围却不难认定。最广义的江南，是对整个长江以南地区的泛称；秦汉时期，主要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，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；唐代以后，则指唐太宗时所分天下十道中的江南道，其范围自湖南西部直到海滨。这个意义上的江南，地域相当辽阔；其人文分野，不仅包含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，而且包括与其同期或先后存在的吴越。无论从哪个意义上，都不能说“小”。近代以来的江南，范围逐渐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，特别是“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北部”^⑤，或“江苏、安徽长江以南和浙江钱塘江流域，甚至包括江苏的扬州和江西在长江南面的几个县”^⑥，更加狭义的，则专指太湖流域或以之为中心的“八府一州”^⑦，而这很大程度上来自江南人的一种自我认定。有学者所指出：“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……而且还具有经济涵义——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，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——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的范围。”^⑧这当然是对的，既透映出作者对于江南文化的自豪，也代表了社会对于江南的一般看法，然而却忽视了问题可能还有另一面，这就是“江南人”文化认同的某种自我封闭。就如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以本地之外的人都为“乡下人”，就如这一区域内部各文化中心之间某种意义上的互不承认。^⑨这类如阿Q以“未庄”之外的一切均为“可笑”的心态，事实上也一再衬托出一种江南之“小”。今人谈及江南，多突出其唯美、诗性，而较少谈及其更复杂的内涵。在一派赞美之声里，像鲁迅这样说“我不爱江南，秀气是秀气的，但小气”，便不免听来有点刺耳。然而，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即便在他这样有着明显的情绪化色彩的表达中，仍然透露出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严肃反思。

同样是谈论江南，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侧重。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，侧重的可能主要是那些与宏观社会历史有关的内容，特别是与历史政治得失相关的财赋、人力一类问题^⑩；文学史家、文化研究者注意的江南，可能更在某些意象、情境。就如专门研究这一领域问题的胡晓明所说：“‘江南’

所指的空间，与其说是具体的地理空间，不妨说是由具有历史与地理的特殊性的特定人物、事件、论述、象征、记忆、想象与幻想，彼此交互作用而形成的。借用一个现成的说法，是一个想象的精神地域共同性 (imagined locality community)，是一种超越经验与理性、融化概念与史识、打通大叙事与小细节的话语。”^⑩这就是说，文化史的研究，始于一种地理图景，而最终形成一种文化心像。对一般生活中的人们，江南不但是一片地理空间，而且是一连串生活意象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学。

正因如此，理解鲁迅的江南印象，也得从对中国文学中江南意象的形成及其审美积淀做起。中国文学中最早成为意象的江南，或许要从《招魂》中“魂兮归来哀江南”说起，但在其之前，人们在《左传》中已可看到：“王以田江南之梦”^⑪，这里的江南，指的也是云梦泽一带。由之可见，春秋战国时期的江南，重心还在楚地。西晋末年，衣冠南渡，中原文明精英汇聚东南一隅，在原称江左的吴越地区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文明中心。六朝时期，江南繁华的代表在金陵，所谓六朝金粉、秦淮烟月；盛唐时期江南繁华的代表在扬州，所谓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”。不过，唐人心目中的江南，仍然包括了楚地。杜甫作《江南逢李龟年》，“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”，时在潭州，也就是今天的长沙。《梦李白》中“江南瘴疠地，逐客无消息”之江南，也应在当时李白从永王璘出征的长江中下游地区。不过，到北宋黄庭坚作《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》，“未到江南先一笑，岳阳楼上对君山”，似乎已将洞庭一带划到了他心目中的“江南”之外。两宋时期江南繁华的代表在杭州，如柳永《望海潮》及无数宋人诗文所咏；明清时期江南繁华的代表，则转移至长三角地区，所谓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，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“八府一州”成为江南繁华的代表。近代以来，江南繁华的最突出代表则转到了上海，所谓“上海摩登”，自有各种有关海派文化的言说为证。可以说，从地理空间意义上看，江南概念的这一变化过程，的确经历了一种从以荆楚山水为代表的浑莽辽阔，到以沪、苏、杭园林艺术为代表的精致小巧的转变。

鲁迅所说江南之“小”，也和一种山水审美意识相关。中国的山水审美，发端于魏晋六朝时期，作为起点的表现，多在高山大川。像《水经注》中的巴蜀（三峡），谢灵运、吴均笔下的浙东。到柳宗元，注意力发生了由大到小的变化^⑫，到五代以后，随着农耕文明的进展，注意力渐趋于江南（徐霞客可算是一个例外）。从地势上看，这里属长江中下游平原，苏州、松江、常州也罢，杭州、嘉兴、湖州也罢，都比较平坦，没有太大的山。杭州周边虽然有不少的山峰，但在真正见过高山大川的人看来，却仍显得不够开阔、辽远。湖山佳胜，常给人一种类乎盆景的感觉，而文人笔墨，更有意地突出这一点。像万历年间在吴县做县令的袁宏道写信给朋友邀其来玩，即以“太湖一勺水”“洞庭一块石”^⑬形容；张岱的名文《湖心亭看雪》描绘西湖雪景，更有“湖上影子，唯长堤一痕，湖心亭一点，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”的名句。至于那些星罗棋布的私家园林，更是以小巧玲珑出名。郑振铎说“苏州市的大大小的园林，就活像是一座座的大盆景”^⑭。郁达夫也说“西湖的山水，若当盆景来看，好处也未始没有，就是在它的比盆景稍大一点的地方”^⑮。

还可注意的是，同样的“小”，也见于人们对于一般居处的印象。苏州的园林多和人居相联，且不说网狮园、“芥子园”一类园子中居住的空间，也不说归有光“室仅方丈，可容一人居”的“项脊轩”，乃至戴望舒笔下“幽长幽长又寂寥的雨巷”、夏衍笔底“上海屋檐下”拥挤狭窄的弄堂，就是一般的江南庭院，也大多难脱狭隘窄小的特点。这一点，只要是去过像胡雪岩故居、茅盾故居、鲁迅故居一类宅院的人，大概都会有深刻的印象。

鲁迅笔下的江南之“小”，也和他对这些地方一些人的人格印象有关。1927年他写信给江绍原，感慨“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”“明即以此亡。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藪。”熟悉鲁迅的人都知道，鲁迅一生，一直不大喜欢“苏州人”。不可否认，这中间的确有对某些人、某些事的偏见或误会。譬如对蒋维乔等人的不良印象^⑯；对顾颉刚的恶感与轻蔑：“只要看明末清初苏州一带地方人的互相标

榜和攻讦的著作就好了。”“……孟德固有齐鲁方士夸诞遗风，然并不比鼻更可怕，在江浙，恐鼻族尤多，不会更好的。”^⑧但将其与“士大夫之好行小巧”与明朝的灭亡联系起来，却可谓一种由来已久的历史“成见”。1928年，他陪许广平游杭，事后谈及印象，也说设若流连西湖风景，则不免“消磨人的意志”“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，身上穿一件罗大褂，和苏小小认认乡亲，过着飘飘然的生活，也就无聊了”。^⑨1934年写的《〈如此广州〉读后感》说到包含在广东人的迷信中的“认真，有魄力”时，出人意料地又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江浙文化：“倘在江浙，恐怕就不肯这样的出死力来斗争，……迷信还是迷信，但迷得多少小家子相，毫无生气，奄奄一息”。^⑩这里的“小”，不但指山水、市容，而且涉及人的胸襟。^⑪“何似举家游旷远，风波浩荡足行吟”，虽是“阻郁达夫移家杭州”，但也未尝没有透露出一种他对杭州乃至整个江南的地理人文感受。这也颇让人想起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：“春天，遂想起/江南，唐诗里的江南……/小杜的江南/苏小小的江南……/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/（那场战争是够美的）……”江南处处似乎都显着“小”，不光像小杜、苏小小这样的称谓突出着“小”，就连吴越争霸的战场，也被称为“小战场”。

所谓江南之“小”，也和某种审美意识联系在一起。江南素称鱼米之乡，碧水、青山、菡萏、鱼米、烟雨、楼台、水乡、曲巷、汀洲、竹树、才子、佳人、青莎、水栅、酒旗、花树、层岩、叠嶂、扁舟、蓑衣、楼台、歌妓……富足、闲适的生活，很容易培植出一种过分精致、细腻的文化。《红楼梦》第48回林黛玉教香菱做诗，批评陆游名句“重帘不卷留香久，古砚微凹聚墨多”：“你们因不知诗，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，一入这个格局，再学不出来的”，批评的是“浅近”，最终所指却是“格局”。不论是重帘留香的内室，还是微凹聚墨的文具，空间的密闭细小，折射出的都是一种极度向内收缩的胸襟。江南一向被视作人文渊薮，书香流传。特别是到明中叶之后，这里经济的发达、社会的繁荣，更让现代人产生出一种被称为“资本主义萌芽”的超时代想象。然而，这同样可以培植出一

种小的“格局”。在清朝文人，龚自珍是对江南文化的这种负面批评最多的人。除了著名的《咏史》，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他在《江左小辨序》中的这段文字：“有明中叶，嘉靖及万历之世，朝政不纲，而江左承平，斗米七钱。士大夫多暇日，以科名归养望者风气渊雅，其故家巨族、谱系多闻人，或劄一书，或刻一帖，其小小异同、小小源流，动成掌故。使倥偬拮据、朝野骚然之士，闻其逸事而慕之，揽其片楮而芳香恻悱。”^⑫这里说到的“小小异同、小小源流”及“揽其片楮而芳香恻悱”，不正是一种“小气”吗？其中对“揽其片楮而芳香恻悱”的讽刺，正可让人联想到鲁迅对牙雕一类艺术及沦为“小摆设”的“小品文”的讥刺。^⑬这种对于小巧精细的趣味，也渗透到现代江南文化里。1922年的上海，曾创刊过一份名为《最小》的报纸（张枕绿主编），其《宣言》曰：“本报的篇幅最小。所以名称‘最小报’。我们的志向不小。愿造为小报之‘最’。”其“闲文”栏明确标榜“闲趣”：“凡俏皮、游记、事记、专谈、专评、诗词、笑话、小品文、插画等，只要能促进读者‘兴趣’，皆可列入范畴。”^⑭其所涉“闲”之定义已颇具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提倡的“闲适”文学观念^⑮。这种对于“小”的偏爱，与林语堂对“苍蝇之微”的认可颇同其趣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苏州大学教授严迪昌曾借他人之口提出过一个“非常直率而又确乎是历史事实”的问题：“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人文荟萃、文教昌隆的地域，除去属于文学艺术范畴外，却未见孕育出思想、政治、军事史上卓具全国影响的伟大人物？”^⑯这里权且不谈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句话所描述的事实是否完全准确，只说其中提出的“伟大人物”之阙如的命题，却正可谓为鲁迅所说江南（苏州）文化之“小”做了某种“背书”。如何准确地理解这一切，当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，但认真地对待，无疑比简单地否定或辩护更有意义。

自然空间也罢，社会空间也罢，还都是外在的东西。江南之“小”，还必须和一种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意识联系在一起。江南繁华，开始于东晋南渡之后。这中间六朝与南宋又有着特别突出地位。

言及历史上的东晋和南宋，人们又常常将之和“偏安”一词联系在一起。自诸葛亮《后出师表》说：“先帝虑汉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，故托臣以讨贼也”的话，“偏安”一词就和某些小朝廷的苟且、偷欢联系在一起，而这一切，最突出地就体现在历来人们对南朝、五代、南宋的评价中。所谓“东南一隅”“剩水残山”，从来都不只是纯客观的描述，而更寄寓了某种深刻的社会忧戚与伤感。“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”南唐后主这一阙《浪淘沙令》，说尽了某种不顾危机，沉迷于南国繁华梦境中的帝王的悔恨与伤心。而在后来的历史和百姓的眼中，苟且贪欢，也是对这些王朝的最简明的批评。只要随便翻翻任一种中国历史，你都能发现，这个词曾经有多么高的出现频率。^②相对于更广大、完整的中国，不管这里的经济、文化有多么繁盛，生活有多么安定、富庶，这一片山水也只能被看作“残山剩水”，被看作“半壁”、“一隅”。或许可以说，这才是江南之“小”的更重要的意义根源。

二 江南之惧：“迷城”意象与文明忧思

江南的迷人，不只在风景的美丽，也在人烟的稠密，生活的富足。早在唐朝，就有人将江南看作人间乐园或人间天堂。“人谓尔从江南来，我谓尔从天上来”（任华）“人生只合扬州死，禅智山光好墓田”（张祜）“人人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（韦庄）。类似的情思，到南宋范成大撰《吴郡志》，便有“天上天堂，地下苏杭”。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江南书写，始终渲染着江南的宜居。然而，过于富足、安乐的生活，同样可能暗含着某种陷溺，某种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。历史学者杨念群论及江南，在引述钱谦益“中原根本在江南”一段论述，说到“清初文人对‘江南’作为帝国财富中心的自信”的同时，指出“富庶为文化繁盛奠定了基础，财富亦为晚明以来的文化消费主义提供了现实保障。‘江南’奢华之地很容易在清朝帝王的心目中幻化为带有自负情绪的‘文化迷城’”“江南的文化最奢侈，最学究气，也最讲究艺术品位，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，‘江南’的文化也最为腐

败”。^③

这的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发现，其中提到的“文化迷城”说法尤为发人深省。不过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一切远非到“满人”才有的“古板严谨”观点，而是早在周秦时代就已开始形成的一种文化印象。可以说，中国人对于逸豫浮华的这种戒惕，是颇类于欧洲人对于尼禄的罗马，或被土耳其人攻陷前的拜占庭的态度的。在中国，这种浮华之城的最早象征，可追溯到周人眼中商纣的“朝歌”，其后，像吴王的姑苏、楚王的楚宫、秦皇的阿房、汉帝的未央、六朝时期的金陵、隋炀帝的扬州、南宋的杭州等，交替成为这种浮华之都的代表。其中有关奢靡的一幕幕表演，更次第构成了中国式尼禄故事的原型。而这也正是鲁迅给萧军的信中说“满洲人住江南二百年，便连马也不会骑了，整天坐茶馆”云云的深层心理背景。

鲁迅对江南（上海、苏州）的文化的反感，包含着中国文化中相沿已久的对“温柔富贵”对人的意志的消磨的戒惕。早在吴越时期，苏州就是江南繁华的中心之一。这里就有“姑苏台”“馆娃宫”的传说，东晋南渡以后，这里在变成中国最富庶、繁华的地方的同时，也成为最能满足人的享受欲望和精神奢靡的地方。吴宫与楚宫，早在唐诗人笔下，就同样成为奢靡颓废的象征。“姑苏台上乌栖时，吴王宫里醉西施。吴歌楚舞欢未毕，青山欲衔半边日。银箭金壶漏水多，起看秋月坠江波。东方渐高奈乐何！”（李白《乌栖曲》）“倾国倾城恨有馀，几多红泪泣姑苏，倚风凝睇雪肌肤。吴主山河空落日，越王宫殿半平芜，藕花菱蔓满重湖。”（薛昭蕴《浣溪沙》）可以说，这种对“迷城”的戒惕，从吴越争霸时代之后，就一直是人们对这一地域的复杂感情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。从六朝到唐，无数的诗文，都将批判性的目光投向了吴王夫差所代表的奢靡艳绮文化。到明清之后，这样的批判也指向了这里的市民生活。明张瀚《松窗梦语》卷七《风俗记》记万历苏州风俗：“东坡谓：‘其民老死不识兵革，四时嬉游，歌舞之声，至今不衰。’夫古称吴歌，所从来久远。至今游惰之人，乐为俳優。二三十年间，富贵家出金帛，制服饰器具，列

笙歌鼓吹，招至十余人为队，搬演传奇；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，转相唱和；一郡城之内，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！人情以放荡为快，世风以侈靡相高，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。”^②这种四时嬉游，“人情以放荡为快，世风以侈靡相高”所造成的，无疑正是市民社会人所祈羨的销魂乡或温柔陷阱。

同样的印象，也出现在人们对扬州、南京（金陵）、杭州，乃至上海的印象中。就自然地地理看，扬州本在江北，但自大运河开凿之后，从隋到唐，这里却一直是江南繁华的代表之地。所谓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”，所谓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倖名”，说的既是这里的繁华，又是这里的奢靡。关于隋炀帝迷恋扬州的繁华，从唐时就一再为文人、民间提及。唐末人著《大业拾遗记》（原名《南部烟花录》，又名《隋遗录》）^③，写的便是隋炀帝沉迷酒色，在广陵建造“迷楼”，终致隋朝灭亡的故事^④。北宋又有人作《迷楼记》（旧题韩偓撰，鲁迅定为北宋人作）^⑤，写隋炀帝晚居“迷楼”，沉迷女色，并自谓“人主享天地之富，亦欲极当年之乐，自快其意。”浙人项升为其构建宫室，“千门万户，上下金碧”“费用金玉，帑库为之一虚。人误入者，虽终日不能出。”隋炀帝大喜，说“使真仙游其中，亦当自迷也。可目之曰迷楼”。“诏选后宫良家女数千，以居楼中。每一幸，有经月不出”，不理朝政，终使隋朝灭亡。这个故事中的迷楼，虽不见正史记载，但屡见于唐宋以来的诗文。^⑥清代赵翼《游孝女测字养亲诗》也写下了“扬州销金窝，动掷千万镒”的诗句。晚到1934年，任职江苏省教育厅的易君左还曾写了一本《闲话扬州》的小册子，因不恰当地说及扬州女性及扬州文化的“懒惰、浪漫、颓废”，引起当地人的不满，酿成一场风波。^⑦其中涉及的许多是非，今天看来或许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迅即成为当地社会的一个“痛点”。1935年郁达夫游扬州，写信给林语堂如此表达他对这座城市的感受：“唐宋文人的倾倒于扬州，想来一定是有一种特别的见解的：小杜的‘青山隐隐水迢迢’与‘十年一觉扬州梦’，还不过是略带感伤的诗句而已，至如‘君王忍把平陈业，只换雷塘数亩田’，‘人生只合扬州死，禅智

山光好墓田’，那简直是说扬州可以使你的国亡，可以使你的身死，而也决无后悔的样子了，这还了得！”^⑧

六朝旧都的金陵，早在当时人眼中，就已是一种轻艳浮华的象征。“江南佳丽地，金陵帝王州。逶迤带绿水，迢递起朱楼。”“妖姬脸似花含露，玉树流光照后庭。”不论是谢朓《入朝曲》，还是陈后主备受诟病的《玉树后庭花》，描述的都是一派流光溢彩的富贵奢靡。六朝之后，明朝是南京的另一个繁华时期。人们对这一时期的记忆，同样常常联系于某种末世情调。从《桃花扇》《影梅庵忆语》《板桥杂记》一类戏曲小说演绎的“秦淮八艳”故事，到《红楼梦》以“烟柳繁花地，温柔富贵乡”形容金陵、姑苏，再到现当代朱自清那篇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、叶兆言的秦淮小说，同样荡漾着这样的迷惘。

从古至今的人们说起杭州，几乎没有人会忘记柳永那首《望海潮》：“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，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……”。据说它曾使金主完颜亮顿生“投鞭渡江之志”。^⑨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三：“西湖天下景，朝昏晴雨，四序总宜。杭人亦无时而游……大贾豪民，买笑千金，呼卢百万，以至痴儿呆子，密约幽期，无不在焉。日糜金钱，靡有纪极。故杭谚有‘销金锅儿’之号。”^⑩元徐再思《朝天子·西湖》：“里湖，外湖，无处是无春处。真山真水画图，一片玲珑玉。宜酒宜诗，宜晴宜雨。销金锅锦绣窟……”然而，这种使帝王和百姓同样沉迷的繁华造成的却可能是精神的萎靡。相传宋高宗到杭州后，曾做过一首题中和堂诗：“六龙转淮海，万骑临吴津。王者本无外，驾言苏远明。瞻彼草木秀，感此疮痍新。登堂望稽山，怀哉夏禹勤。神功既盛大，后世蒙其仁。愿同越勾践，焦思先吾身。艰难务遵养，圣贤有屈伸。高风动君子，属意种蠡臣。”其中频频出现的稽山、夏禹、勾践、种蠡（文种、范蠡），都是越文化符号。初到江南的赵构，显然也曾颇受这种文化感召，心有卧薪尝胆之意。然而，或许正是因为这里的湖山太迷人，这里的街市太富庶，这里的生活太安适，让他最终还是沉迷在歌舞声色之

中，落入被后人嘲笑“朝中有一岳飞而不能用，却思借材与异代”的境地。^③“朱门沉沉按歌舞，厩马肥死弓断弦。”（陆游《关山月》）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”（林升《题临安驿》）类似的感叹，已见于不少宋人的诗篇。鲁迅给川岛的信中说“至于西湖风景，虽然宜人，有吃的地方，也有玩的地方，如果流连忘返，湖光山色，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。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，身上穿一件罗大褂，和苏小小认认乡亲，过着飘飘然的生活，也就无聊了”^④。个中所言，显然与此不无关系。

近代之后，这种以奢靡为特征的“迷城”印象，渐渐扩展到了以长江中下游平原为中心的整个东南地区。清龚自珍《咏史》曰：“金粉东南十五州，万重恩怨属名流。牢盆狎客操全算，团扇才人踞上游。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。田横五百今安在，难道归来尽封侯？”其中所谓“十五州”，恰好对应于今天人们所说的狭义的江南。^⑤“金粉东南”云云中，我们看到那样一种繁华和堕落，仍然启人忧思。

江南文化的突出之处，也在它的世俗性。江南首先是和山水佳胜联系在一起的。从南朝起，就不断有人以“佳丽”形容江南。谢朓“江南佳丽地，金陵帝王州。”孟浩然“江南佳丽地，山水旧难名。”颜真卿“江南之地，佳丽垂名。”这里的佳丽，首先指的当然是秀丽的山水，然而又不止于“好山水”，它常常也让人想到这里的女性。很多时候，两者几乎是难分彼此地浑融在一起。早在南朝，这一褒美中已有“着眼于该地多‘佳丽子’，春光绮丽，便于冶游”的意义。^⑥以“佳丽”名地，突出的不但是山水的秀丽，而且有它的人间情味，其中不乏与情欲有关的东西。从汉魏六朝民歌中的《江南》《子夜歌》《采莲曲》，到梁元帝《采莲赋》“妖童媛女，荡舟心许”一类的宫廷文学，再到数不胜数的唐诗宋词，自古至今的江南书写，似乎始终都与世俗的欲望有理不清的关系。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（汉乐府）这固然是写景，但其中也未必没有可供精神分析的东西。^⑦至于张籍《江南曲》“长干白日沽春酒。高高

酒旗悬江口。倡楼两岸悬水栅，夜唱竹枝留北客……”韦庄《菩萨蛮五首》“如今却忆江南乐，当时年少春衫薄。骑马倚斜桥，满楼红袖招。翠屏金屈曲，醉入花丛宿。”乃至牛峤《忆江南》“红绣被，两两间鸳鸯。不是乌中偏爱尔，为缘交颈睡南塘。全胜薄情郎。”欧阳修《忆江南》“江南蝶，斜日一双双。身似何郎全傅粉，心如韩寿爱偷香。天赋与轻狂……”则直接将一种欲望的放纵当作了风雅的对象。如此多的香艳、甜腻、轻薄，情欲和物欲，堆积在一起，所形成的，自然是中国文学中一条无法被忽视的文脉。而这也正是时至现代之后，从所谓“狭邪小说”到“鸳鸯蝴蝶派”所承继和表现的主要内容。如此江南，就像那一条秦淮河，其间闪漾的不仅有六朝、晚明的金粉，还有一直到朱自清、郭沫若、叶兆言都挥之不去的绮梦。但鲁迅并不属于这样的传统。

进入20世纪之后，江南繁华的主要载体变成了因口岸经济和“洋场”文化崛起的上海。从韩子云的《海上花列传》到侯孝贤的《海上花》，中间还可插入从茅盾的《子夜》、穆时英的《上海的狐步舞》到当代不同时期的名作《我们夫妇之间》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《长恨歌》《繁花》等无数名作。虽然时代有异，但就如李欧梵《上海摩登》章节标题之所列举，由“色、幻、魔”“脸和身体”“欲望、诡计”“颓废和浮纨”……所构成的情调和思想指向，却基本相差无几。^⑧一个个不同的故事，在表面的不同之下，扮演的其实是相当一致的东西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它又常常被看作是一座建立在地狱之上的天堂。这句话不仅被写在穆时英小说《上海的狐步舞》的开头，而且更直观地被设定在当时一些著名的影片的场景安排中，就如《马路天使》（1937）的开头，一连串突出上海摩登的场景后，逐渐下移的镜头焦点“一直移到被沉重的建筑压得不见天日的下层，然后跳出影片的主题字幕：‘上海地下层，1935年’”。^⑨李欧梵批评穆时英“像刘纳鸥和施蛰存，甚至茅盾一样，……因为太沉溺于上海的都会享乐，而未能把这个‘建在地狱上的天堂，真正描绘成一个地狱般的世界’^⑩。繁华与腐败、兴盛与衰亡，正是这样两种不同事物的

交织，构成了江南文化最具政治文化意义的张力。于是，像西方历史对于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反思一样，对“迷楼”的戒惕，不但遍布前人对姑苏、金陵、扬州、杭州的书写，而且深渗于现当代人对“十里洋场”的上海的不断描写。

三 江南何“哀”：芜城情思与偏安之虑

自从贾平凹以“废都”为其小说命名，这个词就获得了一种重要的当代意义。“废都”一词不光被用于“西京”，它同样可以成为许多城市自我文化反思的一个重要凭藉。进入21世纪，作家苏童在与批评家王宏图的一次对话里也说：“南京在历史上好几次被人抛弃，成为废都。”^④这当然也会使人想起苏州、杭州，乃至扬州（江都），有着同类经历的岂止一两座城市。尽管有海外学者傅汉思、宇文所安、巫鸿等人的成果，^⑤但对废墟的研究，在中国文学中仍然很不够。但这实在也是认识中国文学的一条重要途径。以“江南”为名的词牌，不但有“忆江南”“望江南”“梦江南”，还有“哀江南”。中国文化中的江南记忆，很多时候又是和某种废墟文化、亡国之痛联系在一起的。

这里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今存鲁迅手书墨迹中的两幅李白《越中览古》条幅：“越王勾践破吴归，义士还家尽锦衣。宫女如花满春殿，只今惟有鹧鸪飞。”^⑥李白或许不算鲁迅最喜欢的诗人，但却是他一想起做诗，就不免要想到的人物。但他喜欢的李白诗，并不是今人津津乐道的《蜀道难》之类，而是其中比较有屈骚情致的部分。他喜欢《越中览古》，固然与它和越地的关系有关，但更重要的，或许还是其中包含的有关繁华聚散的那种哀歌情韵，正触及了中国文学感伤传统的最深处。中国历史上的废墟审美，或肇端于《诗经》中的《黍离》等作，但其真正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渊脉，则更与以吴楚为代表的江南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。从屈原的《哀郢》《怀沙》，到鲍照的《芜城赋》、庾信的《哀江南赋》；从众多唐人笔下的六朝怀古，到宋明亡国后周密、汪元量、张岱、余怀的追怀旧梦，中国文学上的“哀江南”之作，可谓形成了一

条独具意义的文脉，间杂着繁华旧梦、衰世哀思乃至亡国之痛，形成了极其繁复的意义系统。言说江南文化，不能忽视这样一类作品的存在。^⑦

自鲍照作《芜城赋》，扬州就被称为“芜城”。这首先缘自南朝宋竟陵王刘诞兵败被诛后城市的荒芜，到后来，又加入了隋炀帝、陈后主故事。熟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，大都读过这样的诗文。更不会忘记频频出现在唐宋诗人笔下的那些著名诗句：“于今腐草无萤火，终古垂杨有暮鸦。”（李商隐《隋宫》）“风吹城上树，草没城边路。城里月明时，精灵自来去。”（李端《芜城》）“自胡马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。渐黄昏，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。”（姜夔《扬州慢》）

1935年的郁达夫，曾写过一篇《扬州旧梦寄语堂》的文章。其中说：“扬州之美，美在各种名字，如绿杨村、廿四桥、杏花村舍、邗上农桑、尺五楼、一粟庵等；可是你若辛辛苦苦，寻到这些最风雅也没有的名称的地方，也许只有一条断石，或半间泥房……张陶庵有一册书，叫《西湖梦寻》，是说往日西湖如何可爱，现在却不对了，可是你若到扬州去寻梦，那恐怕要比现在的西湖还不如。”明明自己刚刚游过，却劝林语堂不要再去，理由是“你既不敢游杭，我劝你也不必游扬。还是在上海的梦里想象欧阳公的平山堂，王阮亭的红桥……枕上的卢生，若长不醒，岂非快事。一遇现实，那里还有Dichtung呢！”^⑧

金陵作为六朝故都，留下的同样有无数令人感伤的废墟。从刘禹锡的《石头城》《乌衣巷》，到杜牧的《泊秦淮》、韦庄的《台城》，这样的“哀江南”情调，随处遍布于纵贯千年的诗文。几至于提起“秣陵”一词，让人想起的便是那样一种兴亡陵替、黍离哀痛：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（刘禹锡《乌衣巷》）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”（杜牧《泊秦淮》）“江雨霏霏江草齐，六朝如梦鸟空啼。无情最是台城柳，依旧烟笼十里堤。”（韦庄《台城》）“六朝春草里，万井落花中。访旧乌衣少，听歌玉树空。如何亡国恨，尽在大江东？”（屈大均《秣陵》）“陈隋烟月恨茫茫，井带胭脂土带

香；骀荡柳绵沾客鬓，叮咛莺舌恼人肠。中兴朝市繁华续，遗孽儿孙气焰张。”（孔尚任《秣陵秋》）唐诗中有关金陵的哀歌，从来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。同样的哀情，也见于张炎、周密、汪元量、赵孟頫在南宋灭亡后有关杭州的那些吟唱：“万绿西泠，一抹荒烟。”（张炎《高阳台·西湖春感》）“故园已是愁如许，抚残碑，却又伤今。”（张炎《高阳台》）“露草霜花，愁正在、废宫芜苑。”（周密《三株媚·送圣与还越》）“麦甸葵丘，荒台败垒，鹿豕衔枯莽。正潮打孤城，寂寞斜阳影里。”（汪元量《莺啼序·重过金陵》）“莫向西湖歌此曲，水光山色不胜悲。”（赵孟頫《岳鄂王墓》）“湖山靡靡今犹在，江水悠悠只自流。千古兴亡尽如此，春风麦秀使人愁。”（赵孟頫《钱塘怀古》）

与“天堂”江南一样，“芜城”江南同样是一个不能不令人时时回顾的存在。进入现代之后，对“江南”文化中隐藏的这种感伤与哀痛的表现，同样成为不同情境之下文人学子常常泛起的幻灭诗情。1923年，朱自清、俞平伯同游秦淮河所做的同题散文，一向被看作是新文学写景抒情的名篇，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其中荡漾的“蔷薇色历史”以及“幻灭的情思”^⑤所具有的复杂文化意义。与之相映成趣的，还有郭沫若的《南京印象》：“我是第一次看见了秦淮河。……河水呈着黝黑的颜色，似乎有些腥味。但我并没有起什么幻灭的感觉。因为我早就知道，秦淮河是淤塞了。对于它没有幻想，当然也就没有幻灭。河上也有一些游艇，和玄武湖的艇子差不多，但有些明显的是所谓画舫，飘浮着李香君、葛嫩娘的瘦影。”^⑥说是没有幻想，还是看见了飘浮在画舫上的美人瘦影，中国的文人想到古昔总是免不了要涌起这样一种诗情。

正因如此，自古以来的江南之思中，就一直隐含着一种偏安之虑，一种常将繁华颓靡与败家亡国联系在一起的忧惧。这也给后来人们对江南的印象留下了令人不安的另一面。从吴王夫差到陈后主、隋炀帝，从南唐后主、后唐庄宗到南明诸帝……江南故事，一直少不了这样一串名字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五讲说南宋故事：“侥幸康王南渡，即了帝位，偏安一隅，偷闲取乐。”^⑦这种来自民间的评

判，最能代表社会普遍的认知。而从人们熟知的那些诗文，也随处可见如南唐后主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”；欧阳修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“方其盛也，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；及其衰也，数十伶人困之，而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”一类的感伤。对江南文化寓腐败于繁华的批判，无数次地出现在各类文人的书写里。南朝、宋末的哀歌尚未吟罢，明清兴亡的挽歌又次第而来。历史的此类循环似乎就从未有过终结。就像孔尚任《桃花扇·余韵》中那段著名曲词所唱：“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，秦淮水榭花开早，谁知道容易冰消！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……”（《哀江南》）

从南朝到宋元明清，江南之美就常以这种不堪回首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记忆里。就连那部只为“悲金悼玉”的《红楼梦》，其间回响的也是“月满则亏，水满则盈”“古今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”“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的哀思，以及要那些沉醉于繁华热闹的人“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”的思虑。^⑧

鲁迅1927年写给江绍原的信，就将“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”与“明即以此亡”联系在一起。1935年9月写给萧军的信，又批评“满洲人住江南二百年，便连马也不会骑了，整天坐茶馆。”他为《八月的乡村》作序，一篇千来字的文章，竟然三次引述前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名言：“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”。^⑨这种“一篇之中，三致志焉”（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）的表达，最鲜明地表达出了他对江南文化的真正忧思。就像爱伦堡文章的最后所写：“……土耳其人快到了拜占庭城下，而那儿的绅士还在睡着。他们只会为着争论什么或猜度那可以跑得锦标的车子而兴奋。”^⑩正所谓“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”。就像鲁迅文学曾经讲过的那个“铁屋子”隐喻所示，对民族危难时刻，这样的“睡着”的担忧，一向是他思想关注的焦点。只有明白了这一点，才可说真正理解了鲁迅的“我不爱江南”的深层含义。还应说到的是，虽然说“我不爱江南”，但鲁迅并不将江南文化中这类负面的东西本质化。在他看来，这一切毋宁说是一种历史的产物，就如其在《北人与南人》

中所说：“当然，南人是有缺点的。权贵南迁，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，北方倒反而干净。”即便在涉及“京派”“海派”的论争中，他明确指出的也是这一点。^⑦

作为一种中国人的精神旧乡，提起江南，勾连起的常常是某种间杂着眷恋与感伤的心情。伤逝，不但可谓中国古典文学，亦可谓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基本精神原型。从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那一句“我到底惦着江南了”，到抗战中戴望舒吟哦的“江南的禾稻”，由丽尼吟唱的“江南，美丽的土地，我们的”，到余光中的《春天，遂想起》，“忆江南”即便到现当代中国，仍是文人的常情。作为现实繁华的一种体现，它又常使人产生某种隐然的不安与忧惧。进入20世纪以来中的中国文学，一直都不缺少有关江南文化的精彩书写，从韩子云、李涵秋，到茅盾、郁达夫、夏衍、施蛰存、戴望舒、穆时英、张爱玲、萧也牧、沈西蒙、陆文夫，乃至王安忆、叶兆言、苏童、余华、格非、金宇澄，有关江南的书写，除了刻画它的繁华、绮丽，也常将笔触伸向那些令人不无忧虑的东西。《海上花列传》《广陵潮》《子夜》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《上海屋檐下》《雨巷》《梅雨之夕》《上海的狐步舞》《金锁记》《我们夫妇之间》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《美食家》《长恨歌》《夜泊秦淮》《妻妾成群》《兄弟》《繁花》《好天气》……虽然故事各各不同，风格迥然有别，但若隐或现，总透出一些面对那一座由情欲与物欲构成的文化“迷城”时的莫名怅惘。早的不说，就说格非那部气势宏大的《江南三部曲》——“人面桃花”“山河入梦”“春尽江南”，三个题名三段故事，地点没变，从小镇到县城再到现代化都市，鹤浦还在，但生活及人性本身，却已变得陌生。同样的迷失，甚至更强烈地体现在余华那部评价颇多争议的《兄弟》（下）中。至于是否可从金宇澄《繁花》（及同名电视剧）中读出杜牧《金谷园》诗的微妙情致，则见仁见智，但凭读者各自的感受。就在前面提到的同一次谈话里，苏童还说“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”^⑧，这当然很可以说明他自己作品常常给人的那种带点色情味儿的阴霉、腐败、粘腻，但同时未尝不也承接来自传统江南

书写的某种源远流长的东西。今日的中国，经济发展，社会稳定，江南生活更趋富足。然而如何从江南文化之“小”、之“靡”中脱身而出，如何使渐入繁华的生活不再陷入种种文化或人性意义上的“迷城”，这样一种作为鲁迅江南文化批判的核心的意绪，到今天也是我们不时能在如前述一类作品中，时而听见，时而听不见的东西。

注释：

①刘士林：《在江南发现诗性文化》，《解放日报》2004年10月17日。

②④《鲁迅全集》修订编辑委员会：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532页，第260、329页。

③黄健：《鲁迅为什么说“不爱江南”——兼论鲁迅的人生观、文化观和审美观》；侯桂新：《“我不爱江南”——鲁迅对“江南”的认知与情感》；收入《“鲁迅与江南文化”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2020年10月。

⑤周振鹤：《释江南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39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41-147页。

⑥葛剑雄：《海纳百川上海源》，学林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28页。

⑦参见李伯重：《“江南地区”之界定》，《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》，三联书店2003年版，第447-462页；刘士林：《江南文化理论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1-3页。

⑧周振鹤：《释江南》，《随无涯之旅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，第306-318页。

⑨最能看出这一点的，当数胡晓明在《“江南”再发现——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以及海外有关中国典籍中的“江南认同”》一文中通过一条注释透露的信息：“江南地区的吴越文化相互竞争、互不买账的现象，客观上也突出了‘江南认同’的正当性。古代即有吴越异质、吴越相争的思想与史实。直到当代，仍然如此。笔者的《文化江南札记》出版后，曾接到有江苏文化老人写来的信，痛斥勾践如何忘恩负义，越人如何小人，于今为烈。而笔者在浙江某地图书馆讲演，有主事者囑笔者切勿不可宣传苏州是明清江南文化中心的观点。至于说南京因为不属于吴方言，长期以来并不被承认为吴文化甚至江南文化。凡此种种表明：在现实生活中，‘江南文化’具有‘吴越文化’所不可取代的重要认同功能。”胡晓明主编：《中国文史上的江南——“从江南看中国”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3页。

⑩有关论说，参见黄锡之：《释“江东”》，《苏州大学学报》1983年第3期；李伯重：《简论“江南地区”的界定》，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1991年第1期；陈志坚：《江东还是江南

——六朝隋唐的“江南”研究及反思》，《求是学刊》2018年第2期等。

⑪胡晓明：《“江南”再发现——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以及海外有关中国典籍中的“江南认同”》，胡晓明主编：《中国文化史上的江南——“从江南看中国”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2-3页。

⑫〔春秋〕左丘明撰、〔晋〕杜预集解、李梦生整理：《春秋左传集解》，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601页。

⑬参见拙文《山水审美的历史转折——以柳宗元〈永州八记〉为中心》，《文学评论》2003年第6期。

⑭〔明〕袁宏道：《丘长孺》，〔明〕袁宏道著、钱伯城笺校：《袁宏道集笺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208页。

⑮郑振铎：《苏州赞歌》，《郑振铎全集》第2卷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668页。

⑯郁达夫：《杭州》，《屐痕处处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，第76页。

⑰分别见1927年6月12日、9月19日致章廷谦信，《鲁迅全集》修订编辑委员会：《鲁迅全集》第12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37页、第69页。

⑱分别见1927年7月28日致章廷谦信、1927年8月2日致江绍原信，《鲁迅全集》修订编辑委员会：《鲁迅全集》第12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55页，第59页。

⑲⑳川岛：《和鲁迅相处的日子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73页，第73页。

㉑鲁迅：《〈如此广州〉读后感》，《鲁迅全集》修订编辑委员会：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460页。

㉒在日常生活中，对江浙，特别是上海人“小气”的嘲讽或自嘲，也很常见。像春晚李文启、郭冬临的小品《有事你说话》中，李文启提着带鱼出场的那个情节。

㉓〔清〕龔自珍：《江左小辨序》，《龔自珍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，第200页。

㉔鲁迅：《热风·四十七》，《鲁迅全集》修订编辑委员会：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351页；鲁迅：《小品文的危机》，《鲁迅全集》修订编辑委员会：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590-593页。

㉕编者：《闲文栏》，《最小》1923年第4卷第106期。

㉖这里的比较，参考了我的学生张慧玲硕士论文中的观点，特此说明。

㉗严迪昌：《“市隐”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世族》，《苏州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1991年第1期。

㉘甚至说到南宋山水画的构图风格，都会有人会从这些方面去联想。参见林木主编：《最美山水画100幅》伍“偏安的景致”，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60页。

㉙参见杨念群：《何处是“江南”？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的变异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，第12-13页。

㉚转引自李嘉球著：《苏州梨园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版，第31页。

㉛该书旧题唐颜师古撰，今人多断为宋人或唐末时人作。参见程毅中：《唐代小说史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305-309页。

㉜受启于这个故事，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将其一本研究中国诗歌的专著命名为《迷楼：诗与欲望的迷宫》，可谓抓住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意象，只是受限于论旨，其对问题的讨论只限于“中西诗歌中的爱欲”问题，而不曾留意包含在这个意象中的更有具体意义的文化内容。

㉝讲述这一故事的，还有明清小说中的《醒世恒言·隋炀帝逸游召谴》《隋炀帝艳史》《隋唐演义》等。参见程毅中：《唐代小说史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309页；程毅中：《宋元小说研究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84-87页。

㉞如唐李绅《宿扬州》：“今日市朝风俗变，不须开口问迷楼。”唐杜牧《扬州三首》：“炀帝雷塘土，迷藏有旧楼。”宋秦观《望海潮》：“追思故国繁雄，有迷楼挂斗，月观横空。”宋贺铸《思越人》：“红尘十里扬州过，更上迷楼一借山。”清王士禛《浣溪沙》：“西望雷塘何处是，香魂零落使人愁，淡烟芳草旧迷楼。”清徐昂发《扬州》：“裙屐离穴千年茧，镜拥迷楼万朵花。”另，晚唐人罗隐、宋人李纲都作有《迷楼赋》。

㉟易君左：《闲话扬州》，中华书局1934年版。

㊱⑵⑵郁达夫：《扬州旧梦寄语堂》，吴秀明主编《郁达夫全集》第4卷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179-180页，第184-185页。Dichtung即德文中的“诗”。

㊲〔宋〕罗大经撰：《鹤林玉露》，中华书局2008年版，第241页。

㊳〔宋〕周密著、钱之江校注：《武林旧事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49页。

㊴〔明〕周清原：《西湖二集》，华文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21页。

㊵关于这里所谓“十五州”，旧注多含混处理。当代学者季镇淮从1960年代开始关注这一问题，到1994年终于从《资治通鉴》卷231胡三省注查得：“唐时浙江东、西道所统，惟润、升、常、湖、苏、杭、睦、越、明、台、温、衢、处、婺十四州。前此（韩）滉遣宣、润弩手援宁陵，盖兼统宣州，为十五州也。”参见孙静：《石韞玉而山晖——深切悼念季来之（镇淮）师》，《群言》1997年第6期。又，所谓“十五州”的说法，早见于宋叶适《进卷·民事中》：“夫吴、越之地，自钱氏时独不被兵，又以四十都邑之盛，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，而衣冠贵人不知几族，故以十五州之众，当今天下之半。”（〔宋〕叶适

著,刘公纯、王孝鱼、李哲夫点校:《叶适集》第三册,中华书局1961年版,第654页。)也就是说所谓“十五州”,指的主要是五代时期吴越国辖地。有学者指出:钱镠归宋时,吴越国本有“十三州一军”,但当宋军攻打南唐时,又趁机从南夹击攻占原属南唐的润州和常州,从而拥有十五州之地。参见陈志坚:《杭州何以成为“东南第一州”——隋唐至北宋杭州的发展轨迹》,包伟民编:《江南忆最忆是杭州:千年以来东南地区文化区位重构与杭州的崛起》,杭州出版社2021年版,第103页。

④参见张伟然:《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》,李孝聪主编:《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,第371-372页。

⑤闻一多:《说鱼》,《闻一多全集》第1卷,三联书店1982年版,第121页。

⑥引文均见该书章节标题。〔美〕李欧梵:《上海摩登: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-1945》(修订版),毛尖译,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。

⑦杨司奇:《上海的“前世今生”:一座造在地狱上的天堂?》,《新京报·书评周刊》2018年12月22日。

⑧〔美〕李欧梵:《上海摩登: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-1945》(修订版),毛尖译,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,第233页。

⑨⑩苏童、王宏图:《南方的诗学:苏童、王宏图对谈录》,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,第106页,第99页。

⑪巫鸿:《石涛和中国古代的“废墟”观念》,郑岩编:《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论文集(第五辑):残碑何在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,第243-244页。

⑫倪墨炎:《鲁迅和李白的〈越中览古〉》,《鲁迅旧诗探解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,第364页。

⑬关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废园情思,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做过研究,其中内容均多涉及江南文化。参见赵园:《废园与芜城》,载《想象与叙述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,第54-84页;巫鸿:《石涛和中国古代的“废墟”观念》,郑岩编:《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论文集(第五辑):残碑何在》,上海人民出版

社2021年版,第243-270页。

⑭朱自清: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,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:《朱自清选集》,开明出版社2023年版,第31页、第40页。

⑮郭沫若:《南京印象》,丁帆编:《金陵旧颜》,南京出版社2014年版,第395页。

⑯〔明〕凌濛初:《二刻拍案惊奇》,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,第63页。

⑰分别见《红楼梦》第13、1、5回秦可卿托梦王熙凤语、《好了歌》及《红楼梦曲词》。〔清〕曹雪芹著:《红楼梦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169页、第17页、第86页、第170页。虽然对于《红楼梦》中的大观园究竟在何处,红学家们颇有争议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书中所写的富贵繁华的确与东南一带有着更深的关系。金陵、扬州、姑苏,对于故事中人无疑都是很重要的地方。《红楼梦》第一回:“当日地陷东南,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,有城曰阊门者,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”林黛玉家在扬州。史太君所属的史家和王熙凤所属的王家,都是金陵人。

⑱鲁迅:《田军作〈八月的乡村〉序》,《鲁迅全集》修订编辑委员会: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295-297页。

⑲〔前苏联〕爱伦堡:《论莫洛亚及其他》,原载1935年3月《译文》第2卷第1期。〔美〕纪德等著:《邂逅草》,黎烈文译,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,第101页。

⑳鲁迅:《南人与北人》,《鲁迅全集》修订编辑委员会: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456页。

(作者单位: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、文艺批评研究院。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古典传统重释重构及其互动关系史研究”阶段性成果,批准号:21&ZD267)

责任编辑:赵雷